

一代新人



一代新人

——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先进事迹选

中共河南省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办公室

河南人民出版社

一代新人

——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先进事迹选

中共河南省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办公室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1976年2月第1版 1976年2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3105·263 定价 0.27 元

毛主席语录

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他今天把自己结合于工农群众，他今天是革命的；但是如果他明天不去结合了，或者反过来压迫老百姓，那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了。

毛主席语录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目 录

坚定地走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的道路

.....方城县四里店公社徐树国青年组 (1)

在斗争中扎根 在斗争中成长

.....禹县火龙公社马寨大队青年队 (12)

艰苦奋斗学大寨 自力更生创新业

.....汤阴县白营公社北店青年队 (26)

看书学习 贵在坚持

.....鲁山县张良公社李庄大队青年队 (34)

身残志更坚 永远干革命

.....郾城县黑龙潭公社半截塔大队回乡知识青年 王玉梅 (48)

同旧传统观念决裂 做社会主义新型农民

.....开封县杜良公社杨寨大队下乡知识青年 张巧玲 (58)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 在广阔天地锻炼成长

.....洛阳市郊区古城公社东杨屯大队下乡知识青年 魏翠霞 (67)

坚持乡村干革命 志在全球一片红

.....郑县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大李庄大队下乡知识青年 陈民政 (78)

坚持乡村 革命到底

.....新乡市郊区北站公社金
灯寺大队下乡知识青年 赵春风 (90)

扎根农村干革命 誓当一代新农民

.....睢县尤吉屯公社陈岗
林场下乡知识青年 何素勤 (101)

认真看书学习 牢固扎根农村

.....鹤壁市石林公社南唐
宋大队下乡知识青年 石巧玲 (113)

广阔天地炼红心 誓做革命接班人

.....焦作市郊区朱村公社北
朱村大队下乡知识青年 赵金钟 (121)

在农村干一辈子革命

.....上蔡县塔桥公社大姬大队下乡知识青年 陈金荣 (132)

坚定地走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的道路

方城县四里店公社徐树国青年组

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的好青年徐树国同志，遵照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教导，一九六九年元月，从郑州市第四十中学毕业后，到方城县四里店公社余庄大队罗庄村安家落户。他坚定地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虚心向贫下中农学习，满腔热情地为贫下中农服务，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一九七一年三月十二日，在修建大寨田的战斗中，徐树国同志为了掩护阶级兄弟，不顾自己的安危，在排除哑炮时献出了壮丽的青春。为继承徐树国同志的革命遗志，我们南阳市第四中学的十名同学和郑州市第四十中学的十九名同学，分别于一九七三年五月和一九七四年四月，先后来到四里店公社余庄大队和四里店大队三道沟生产队安家落户，组成了“徐树国青年组”。下乡以来，我们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以徐树国同志为榜样，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坚决走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的道路，思想感情和精神面貌都发生了比较深刻的变化。现在已有两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三人加入了共青团，十九人分别担任了赤脚医生、拖拉机手和理论

辅导员等。贫下中农赞扬说：“徐树国没有死，你们都象徐树国！”

到徐树国战斗过的地方去落户

徐树国同志生前战斗过的四里店公社，是“庄稼山上长，云彩山下跑”的偏僻山村，是锻炼我们的好地方。到这里安家落户，是我们的强烈愿望。徐树国生前曾在自己住室门前贴过一副对联：与工农兵群众相结合风吹不转向，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浪打不回头，横披是：任重道远。来到这里后，为了表达我们向徐树国学习、坚决实行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的坚强决心，行李卷一放下，我们就把对联的横披改为“再续新篇”，重新把这副对联贴到门上。大家立志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做出自己的贡献。

但是，徐树国的遗志究竟应该怎样继承？“新篇”应该怎样续？开始我们认为，向徐树国学习，就是要做到徐树国干啥咱干啥，徐树国咋干咱咋干。徐树国生前曾多次不顾个人安危抢救集体财产，我们也这样干。一次山洪暴发，麦田旁边的排水渠决口了。贾桂钊同学发现后，立即跳进激流，用身体挡住决口，让贫下中农在自己身旁填土垒石，堵住了决口。同学们的身板虽然都不硬棒，但无论干啥活都和队里的强劳力比，不怕出力流汗。一次，队里铲草积肥，男劳力一晌可铲五、六十斤，可是陆剑敏、曲利荣、王存之三个女同学，手上打泡不少，铲草却不多，一个上午总共只

铲了五十来斤，每人平均不到二十斤。她们又气又急，晌午连饭也没吃就上了山，一直干到星星满天才下山，平均每人铲草七十多斤。在为贫下中农服务上，我们也处处向徐树国学习。谁家原来吃过徐树国担的水，烧过徐树国挑的柴，不管农活再忙再累，我们也叫他们吃到俺担的水，烧上俺挑的柴。我们满以为只要这样干下去，就算是继承遗志“续新篇”了。

但是我们从贾桂钊同学替队长敲钟的事情中得到了深刻的启示：罗庄生产队的钟原来是老队长张自山敲的，徐树国为了锻炼自己把任务接了过来。只要徐树国在家，钟就能应时响，群众都管他叫“打鸣鸡”。徐树国同志牺牲后，张自山又继续敲起来了。我们来到罗庄后，贾桂钊同学想接这个“班”，可老是自己没起床钟声就响了。一天早晨，东方还没有发白，贾桂钊发现老队长张自山已经起了床，问他为什么起这么早，张自山说：“钟声就是号令。钟敲晚了，学大寨的步子就会慢下来。所以，任凭少睡会儿，也不能误了敲钟啊！”老队长的话，使贾桂钊找到了没接好这个“班”的原因：以往总认为是自己的瞌睡大，实际上是缺乏徐树国同学那种虚心向贫下中农学习的精神，没有学到老贫农张自山对革命工作高度负责的优秀品质。根源找到了，钟也能应时敲了，贾桂钊也变成了罗庄生产队的“打鸣鸡”。

敲钟这件事引起了大队党支部的注意。党支部副书记刘增臣同志和我们一起学习毛主席关于“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的伟大教导，组织大家反复讨论向徐树国学什么

和怎样学的问题。大家认识到，徐树国所以能成为知识青年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榜样，是他向贫下中农认真学习的结果。我们向徐树国学习，就要象他那样虚心接受再教育，刻苦改造世界观，真正把立足点移到贫下中农这边来。如果仅仅是徐树国担水我担水，徐树国扫地我扫地，满足于比葫芦画瓢地做好事，学习徐树国就学不到点子上，那样，即使是睡在徐树国生前睡过的床上，举着徐树国生前举过的大镐，也不见得和他想的一个心思，干的一道劲。

同志们思想开窍后，时时处处注意从贫下中农身上吸取政治营养。赤脚医生刘克勤，平时不仅把送医送药、防病治病看作是为贫下中农服务的具体行动，而且也当作是向贫下中农学习的好机会。一次，他到贫农李大娘家巡诊，患胃病三年不能起床的李大娘拉着他的手说：“旧社会咱想种地没有地，长双手只得掂讨饭棍。解放后，托毛主席的福有了房子有了地，又走上了集体化道路，可我偏偏又病得起不来床，别人一下地，我就心急手发痒。”李大娘几句话，使刘克勤受到很大教育，他决心治好大娘的病。为了摸到准确的穴位和体验针感，他多次在自己身上试扎。从青年组到李大娘家，隔了一座山岗，路途比较远。他白天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利用晚上的时间去给大娘治病。一连两个月，风雨无阻。在他的精心治疗下，李大娘终于恢复了健康，走上了生产第一线。

真正与贫下中农相结合

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我们有了一定的进步。贫下中农对我们那怕是微小的进步也给予很高的评价，说我们“皮肤晒黑了，思想炼红了”。少数同学也认为自己城里生城里长，过去手不能提，肩不能挑，眼下手上已磨出一层厚茧，肩上也压出了“肉馒头”（肩茧），不管啥活，再苦再累没有松过套、退过坡，也确是很不错了。因而，在一片赞扬声中，心里美滋滋的，觉着接受再教育已经“差不多”了。

大队党支部书记张宏堂同志发觉这种现象后，感到很不安。他对我们说：“**阶级斗争是青年的一门主课**。徐树国一到罗庄就进行社会调查，你们也应该这样做。这可是你们‘续新篇’的重要内容啊！”我们就照支书说的去做，收获果然很大。通过调查，我们对毛主席关于“**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是贫农**”，“**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的伟大教导，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我们了解到，全村二十多户贫下中农，解放战争时参战支前、斗地主分田地的是他们；解放后，带头走集体化道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建设社会主义的是他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坚决起来造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反；批林批孔运动中，他们狠批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和孔孟之道。贫农李大伯跟我们青年组住在一个院里，以前，我们和他是做活膀靠膀，吃饭在一起，觉得他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贫农，没有感到他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但经过了解，使我们大吃一惊，就在

这个普通的老贫农身上，竟有这么多不寻常的东西：解放战争时，他是一名优秀的持枪民兵，在对敌斗争中赤胆忠心；土地改革时，他是农会干部，把近地肥地分给群众，把远地薄地留给自己；合作化时期，刘少奇大砍合作社，村上有几户中农要退社，他一面登门做思想工作，一面带领大家发扬“穷棒子精神”，迅速发展生产，硬是依靠集体的力量粉碎了这股妖风；人民公社化后，他担任罗庄生产队政治队长，和全体社员一起大干，使粮食亩产由原来的二百多斤上升到五百多斤；这几年，他为了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主动提出把政治队长的职务让给年轻的共产党员杨富增，他自己退职不褪色，经常帮助杨富增出主意想办法；他的三儿子，原来也在深翻改土专业队，是和徐树国同志一起牺牲的，他刚把儿子安葬好，就又下地干活了，并把大儿子又送到了深翻改土工地；……这一切，虽然我们已来余庄多时，可李大伯从来没有向我们表白过。了解到李大伯的这些崇高品质，我们仿佛是刚认识他，觉得他的形象特别高大，特别令人可亲可敬。

毛主席教导说：“和工人农民交朋友，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现在也有一些人到工厂农村去，结果是有的有收获，有的就没有收获。这中间有一个立场问题或者态度问题，也就是世界观的问题。”我们的“立场问题或者态度问题，也就是世界观的问题”究竟在那里呢？大家在找和徐树国同志的差距时，回忆起徐树国中午锄草那件事。一个伏天的中午，地热得烫脚。收工后，徐树国发现有几个老贫农仍然在玉米地里锄草，徐树国打招呼说：“天这么热，别人都收工

了，您们还在锄呀？”几个老贫农回答说：“热点怕啥，越热越是锄地的好机会。”徐树国走近一看，锄掉的草，转眼间就被太阳晒成了“软面条”。徐树国从这件事中立即意识到自己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不如贫下中农。第二天中午，徐树国就光着脊梁，顶着火一样的烈日在地里锄起草来，越热越锄得起劲。伏天中午天气热，草死得快，这是一般的常识。该收工了，有的社员再赶一阵子活，这个也不罕见。可是徐树国却从这些习以为常的事情上想得很深很远，想到要把贫下中农的可贵精神学到手。我们前段所以会产生“差不多”的想法，和徐树国比，差就差在世界观没有得到彻底改造，缺乏“自知之明”，没有象他那样做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有心人。

通过社会调查和对照徐树国找差距，大家进一步加深了对贫下中农的阶级感情，增强了为贫下中农服务的自觉性。王刚建同学在面粉加工房工作，他发现农活一忙，社员们总是饭菜放凉了还没有从地里回来；吃了饭，碗一推，烟也顾不上抽，就又下地了；如果再让他们送粮取面，那就更辛苦了。于是就带头破了老规矩，抽空把全村各户社员的吃粮情况登记下来，谁家啥时需磨面，磨啥面，到时间主动登门拿粮，磨好后又送面上门，改变了过去社员到加工房排队送粮取面的现象。

为贫下中农服务热心，向贫下中农学习更留心。一天上午，张申同学和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刘增臣同志一道从县城办事回来，跑得都有点腿疼腰酸。张申见庄上都冒炊烟了，身

子一歪就躺到了床上。一会儿，同学们锄地回来了，张申看到刘增臣同志满头大汗地也在人群里面。这件事对张申触动很大。从此，他不管外出做什么事，都坚持挤时间参加劳动。余庄大队离公社五里多路，去年春天公社举办理论骨干学习班，每天上午八点钟开始学习，晚上讨论到半夜，张申放着公社安排好的床铺不住，坚持夜里回青年组住宿，早晨同社员一道劳动。学习班办了八天，张申在队里劳动了八个早晨。

为了更好地向贫下中农学习，为贫下中农服务，我们又揣摩出了一个比较理想的办法，就是同贫下中农合户。罗庄生产队队长张自山同志，是一个苦大仇深的老党员、老贫农、老复员军人，今年五十七岁了，无儿无女无老伴。他一心扑在集体上，遇到忙天连饭也顾不上做，老是啃个干馍就上地了。他和徐树国经常在一个锅里吃饭，在一个床上睡觉。我们去后，他也象对徐树国一样对待我们。他把房子腾给我们住，自己却搬到菜园旁边的一个草棚里。他的小名叫年，我们就叫他年叔。我们看他阶级本质好，路线斗争觉悟高，年龄大了，又需要人照顾，就提出同他合户，他看这样对我们也便于从政治上管，生产上教，生活上帮，就同意了。于是，我们就建立了一个新型的家庭。从此，他就不再是无儿无女的老人了，我们都成了他的孩子。老人一进门，同学们就把饭菜端到跟前；老人的衣服被褥，同学们替他拆洗缝补；老人病了，一家人轮流守护，端茶送水，请医煎药。他把我们也看成自己的亲生儿女，无论是政治学习，生产劳动，还是生

活上的事，他总是该说就说，该管就管，我们随时随地都能受到教育。去年秋收时节，一位同学急于做好饭，只拣个头大的红薯往锅里放，而把刨烂的碎薯块倒在猪圈旁边。年叔回来发现了，就一块一块地拾起来，细心地旋好洗净，第二天中午亲自做饭，把这些小红薯蒸得软溜溜的，端到我们面前。他看我们吃得都很香甜，就问我们：“这红薯块小不小？”我们说：“小。”他接着说：“八百里伏牛山可怪大，如果今天搬掉一块石头，明天担走一挑土，到头来也不会有这个伏牛山了。”他看我们都会意地低下了头，就深情地说：“旧社会我光脚丫踏着雪要过饭，扛长工挨过地主的皮鞭，别说有这些小红薯，就是有红薯皮吃我也不会去要饭扛长工啊！”这顿饭不仅使我们受到了深刻的阶级教育，而且也使我们学到了贫下中农艰苦朴素的好品质。

以贫下中农为师，勇挑革命重担

实践告诉我们，要真正与贫下中农实行结合，还必须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在三大革命斗争中冲锋陷阵，心贴心地和贫下中农并肩战斗。三道沟生产队有一位主要干部，由于受修正主义路线和孔孟之道的毒害比较深，侵占集体耕地盖房子。事前，又是选“吉日”，又是看“风水”。贫下中农给他提意见，他不但不接受，反而撂挑子不干。那阵子正值伏天大旱，地干得裂口，玉米叶子都快旱干了。

怎么办？在大队党支部的支持下，王郑建同学勇敢地挑

起了生产队队长的重担。担子放到了王郑建同学的肩上，却压在了全组同学的心上。一人当队长，全组是参谋。可是，这个队二百多亩耕地，究竟如何安排抗旱这场斗争，我们的心中都没有数。老贫农沈天才主动带领我们察水情，定方案。那里该修渠打堰，那块地能安水泵、挂轱辘或者得用水桶挑着浇，他都说得一清二楚。在贫下中农的帮助下，终于定出了抗旱计划。这个队有三十八户人家，分散在三个山头八个自然村里。开始，王郑建每天安排农活，总是头天晚上坐半夜，向贫下中农请教，到了后半夜，就不敢睡觉了，光怕睡过头，出现窝工现象。看到这种情况，老贫农薛万亭大伯，就给他出主意想办法，按自然村把劳力划分成作业组，分配任务，提出要求，建立起集体生产责任制；各作业组之间还开展比团结、比干劲的劳动竞赛活动，加强了政治思想工作，提高了生产效率。就这样，在贫下中农的共同努力下，天大旱，人大干，秋季又夺得了比一九七三年较好的收成。在抗旱斗争中，我们还经常找那个干部谈心，和他一起学习毛主席关于“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伟大教导，一起忆苦思甜，使他提高了路线斗争觉悟，认识和改正了错误。三道沟生产队又出现了团结战斗的新局面。

斗争实践使我们的阶级觉悟和路线觉悟不断得到提高，我们决心把阶级斗争当作一门主课，坚持斗争哲学，站在斗争的最前列。一九七三年九月，罗庄村贫农社员郑自甫因病去世，家属准备用响器、打幡、烧纸钱、吃桌饭等来办理丧事。同学们听说后，立即同几个回乡知识青年一起，扎了一